

僧侶從軍？—— 抗戰後期漢藏教理院兵役案的爭議 （1943-1944）

李 濤

摘 要

南京國民政府1936年實施「兵役法」，要求僧人亦須履行國民義務，依法服兵役。經僧團抗爭後，國民政府實未嚴格執行徵召僧人入營服常備兵役。隨著抗日戰爭日趨嚴峻，1943年國民政府為革新役政，修訂「兵役法」，詳加規範免、緩役的申請程序和範圍，致使僧人申請免服常備兵役陷入無法可依的窘境。

本文以漢藏教理院因應新修兵役法的運作做為個案研究。該院是抗戰時期太虛法師及其門人重要的活動基地，在新修兵役法後試圖以其可稱為「邊疆文化教育機關」，比附「兵役法」中有關「專科以上學校」之規定，得申請緩徵、緩召，卻因其「私立性質」連遭地方政府、軍政部和教育部相關司科拒絕。太虛不得不動用私人情誼，請託教育部長陳立夫，讓該院得以「對邊疆之一種重要工作」為由，獲得軍政部長何應欽的法外豁免，准予暫免徵召。

漢藏教理院解決服役案，看似是由「私誼」促成，實則源於此前太虛和該院對戰時國民政府外交及應對西藏問題等「公事」的貢獻。因此，本個案不僅揭示「私誼」與「公事」之間的互動對戰時政教（佛教）關係的型塑，也呈現太虛及漢藏教理院於不利局面下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動性和策略。

關鍵詞：太虛、漢藏教理院、兵役、陳立夫、邊政

Monks Becoming Soldiers? A Dispute of the Sino-Tibetan Buddhist Institute to Exempt from Military Service during the Second Sino- Japanese War, 1943-1944

Tao Li*

Abstrac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mplemented “Military Service Law” in 1936, requiring monks to perform their 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military service. After protest and resistance from the Sangha, the government did not strictly enforce the conscription of monks into the army for standing military service. With the increasingly severity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mended the Military Service Law in 1943 in order to strengthen its military. The new law detailed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s as well as the scope of exemption and suspension for military service, which resulted in a narrowing path for monks to exempt from standing military service.

This paper takes the Sino-Tibetan Buddhist Institut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Hanyuan”) as a case study of the Sangha respons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military service law. Hanyuan was an important activity base for Master Tai Xu and his disciples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As the new military service law was promulgated, they tried to apply for a suspension of conscription on the basis that the academy was a “frontier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e,” with reference to the provisions in the law concerning “schools above junior college.” However, due to its status as a “privately owned institution,” the application was repeatedly rejected by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Ministry of Military Affairs,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he

* Doctoral Student, Institut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nd Tai Xu had to use his personal connections with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Li-fu Chen, to ask for an extrajudicial exemption for Hanyuan. With the help of Chen, Hanyuan finally obtained a temporary exemption from military service from Ying-qin He, the Minister of Military Affairs, on the grounds that it provided “important works for the frontier.”

The resolution of the military service problem by the Hanyuan appears to have been facilitated by personal connections, but it was also a recognition of previous contributions Tai Xu and Hanyuan had made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official business,” such as wartime diplomacy and handling of the Tibet issue. This case not only reveals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Buddhism) in wartime China was shaped by a mixture of “private friendship” and “official business,” but also demonstrated the talent and strategy of Tai Xu and Hanyuan in safeguarding their interests under adverse circumstances.

Keywords: Tai Xu, The Sino-Tibetan Buddhist Institute, Military Service, Li-fu Chen, Frontier Management

僧侶從軍？—— 抗戰後期漢藏教理院兵役案的爭議 (1943-1944)*

李 濤**

壹、前言

1936年3月1日，南京國民政府開始實施「兵役法」，中華民國男子年滿十八歲至四十五歲，需要依法服兵役。¹ 以往被視為「方外之人」的僧人，亦要依法履行這一國民義務。然佛教以「戒殺」為第一教義，服兵役意味著很有可能參與戰爭，僧團為此進行了長期的抗爭。為兼顧僧人宗教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國民政府相關部門曾制定針對僧尼的兵役政策。該政策雖明確要求僧人依法服兵役，卻未明令須徵召入營，服常備兵役。抗戰後期，國民政府於1943年3月15日頒行新「兵役法」，其中一項重要調整，即明定免緩役條款、緊縮免緩役範圍，試圖以此限制以行政指令擴大免緩役範圍的不良現象，達到革新役政的效果。此項調整直接導致僧人申請免服常備兵役，陷入無法可依的窘境，以至於對非常時期僧人服兵役態度積極的太虛法師，亦親自參與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以下簡稱「漢

* 本文修訂過程中，承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何卓恩教授提供寶貴意見，後又承蒙兩位審查人及編輯委員會攻錯斧正，使文稿更臻完善，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22年5月9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年9月22日。

**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

¹ 〈兵役法〉，《軍政公報》，第228號（1936年5月30日），頁32-34。該法於1933年6月17日由南京國民政府公布，1935年3月2日對第七條進行修訂，1936年3月1日起施行。

院」)爭取免緩役的抗爭活動。漢院是由太虛主持的一所佛學院,係其世界佛學苑體系的一支,1932年成立於重慶縉雲寺,1950年停辦。該院以溝通漢藏為職志,實際上是太虛佛教革新派戰時重要的活動基地。抗戰後期的漢院兵役案,太虛用力頗深,其間牽涉人員和層級甚廣。此案不只關涉太虛、漢院和新「兵役法」的推行,還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戰時國民政府佛教管理的實況。

關於此案究竟,龔雋及其團隊無論是整理材料還是提出問題,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探索。²然龔氏因未注意到重慶市檔案館所藏的《北碚管理局》檔案和《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檔案,不僅未能完整重建該案的基本過程,而且其意在「重估太虛」,可未發之覆尚多,仍有深入探討的必要。是以不揣譾陋,進一步發掘相關檔案材料,在釐清抗戰後期漢院兵役案來龍去脈的基礎上,以漢院因應新修兵役法的運作做為個案研究,一方面揭示「私誼」與「公事」之間的互動邏輯對戰時政教(佛教)關係的型塑,另一方面展現太虛及漢院於不利局面下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動性和策略。

貳、漢院兵役案緣起

漢院作為一所設於重慶縉雲寺的佛學院,既不同於一般寺院,也與一般學校迥異,兼具學校和叢林雙重特徵。1937年11月,漢院組織防護訓練,太虛曾在訓辭中提到過這種特殊性:「本院院生之受訓有兩重關係:(一)本院係教育廳備案及領補助費之一學院,奉廳令須與高中以上一般學生同受軍訓;(二)本院院生係僧眾占大多數,故呈行營及教廳,依訓練總監部所頒僧眾得特組專施救護、防護之規定,另成特組之訓練。一般學校學生無本院院生多係僧眾之關係,故不須另成特組,一般寺院僧眾無本院院生係學生之關係,故不須定受特訓,此為本

² 龔雋及其團隊利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初步梳理了漢院兵役案的過程,他們的研究,分為整理檔案和解讀分析兩部分。參見龔雋、賴嶽山,〈「太虛檔案」三:太虛法師與漢僧兵役(1943-1944)〉、〈重估太虛法師(引論)——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民國教育部檔案為中心〉,收入中山大學人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主辦,《漢語佛學評論》,第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79-95、157-174。

院院生須一律受特組訓練之理由。」³ 漢院最終還是以「特組」之名，成立防護訓練隊。至少說明，漢院院生更傾向於僧人本位，而區別於一般世俗學校學生。

這是漢院在1943年之前並未受徵兵困擾的一個重要原因。1936年3月1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實施「兵役法」，由於該法並未明確僧人服役辦法，國民政府針對地方反映的僧尼兵役問題，曾制定有針對性的兵役政策。該政策由相關部門的行政指令組成，其主要內容大體呈現出明顯變化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36年6月11日至1939年4月19日，僧人免服常備兵役，須服國民兵役，壯丁訓練時側重救護訓練，尼眾則應參加看護訓練。⁴ 第二階段，1939年4月19日至1943年11月，國民政府遷渝之後，綜合考慮邊疆政治與役政大局，將蒙藏僧眾與漢僧區別對待，允許前者緩役，後者仍須服國民兵役。⁵ 第三階段，1943年11月至抗戰結束，軍政部提議，漢僧應徵服常備兵役，最終在川渝僧團抗議之下，改為漢僧已受戒者緩徵，仍服國民兵役，未受戒者依法照服常備兵役。⁶ 也就是說，1943年以前，國民政府並未明確要求徵召漢族僧人服常備兵役。換言之，至少在政府政

³ 太虛，〈復興佛教僧侶應受軍訓——對漢藏教理院防護訓練隊訓辭〉，《海潮音》，第19卷第1期（1938年1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8卷（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年，該套書以下省略出版項），頁61。由於《海潮音》月刊受經費影響，編輯人員及編輯處所在地時常更換，造成該刊編輯體例不一，刊期出現以卷期、卷號，或用年期或年號編序，頁碼亦有加列分類欄目重計的現象，本文皆按照原刊體例，不做改動，特此說明。

⁴ 「內政、軍政兩部呈行政院」（1936年9月7日），〈全國壯年僧尼悉令參加救護訓練工作的有關文書〉，《內政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12（6）-14692。太虛所謂「依訓練總監部所頒僧眾得特組專施救護、防護之規定」，即是這一階段國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⁵ 〈政府注意佛教文化及僧眾兵役〉，《海潮音》，第20卷第7、8號合刊（1939年8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9卷，頁480。

⁶ 「渝江師管區司令部致北碚管理局代電」（1944年10月17日），〈關於緩徵蒙藏僧人服兵役的訓令、代電〉，《北碚管理局》，重慶市檔案館藏，檔號：00810004030240000212000；〈本會批青島湛山寺為漢僧緩服常備兵役批仰知照由〉，《海潮音》，第27卷第12期（1946年12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203卷，頁191。軍政部下達的訓令，以及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這一批文，皆將行政院「義二字第一三〇一六號指令」發布時間誤作「（民國）33年2月12日」，明顯有誤。今據《海潮音》當時報導及太虛年譜更正為「1944年6月12日」。參見〈漢僧免服常備兵役〉，《海潮音》，第29卷第9、10期合刊（1944年10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201卷，頁500。

策上，並未要求徵召僧人當兵，他們所參與的兵役活動，主要是國民兵役訓練以及救護工作。

當然，這一點還不足以說明漢院此前未受徵兵困擾的原因，因為僧人雖在政策上無須徵召入營，並不意味著不會被地方強拉當兵。⁷ 所以漢院所在地方的徵兵秩序，亦是一個關鍵因素。漢院所在的北碚地區，地處江北、巴縣、璧山、合川四縣交界處，原屬四川巴縣。辛亥以後，該地區匪患嚴重，1916年川省在此處設立江巴璧合四縣峽防營，專門負責周邊治安清匪任務。1923年改設江巴璧合特組峽防團務局，屬於治安聯防機構，不具有地方政權性質。1936年，峽防團務局局長盧作孚為推行鄉村建設計畫，經川省政府轉呈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成立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試驗區，設立實驗區署，隸屬於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但職權僅限於民政、保安、建設、教育，屬於臨時性行政區。直到1942年3月1日，實驗區署改為北碚管理局，才成為隸屬於四川省政府的縣級行政區。⁸

四川省於1937年成立兵役管區，其轄屬各縣隨之設立兵役機構，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試驗區因為不屬於正式行政區劃，一度被視為例外，未予徵兵。直至1939年1月，在周邊各縣提議下，川省政府才令實驗區署設立兵役室，開始承擔兵役配額任務。⁹ 出人意料的是，在實驗區署的支持下，陶行知的志願兵區方案得以試行，開展了三期志願兵運動，取得了良好效果，大批壯丁自願從軍。北碚地區在前期徵兵中得以志願兵代替徵兵，後來基本上也是以勸募為主，對於不足之數，才進行抽籤徵集。¹⁰ 從1939年到1943年，北碚地區總共徵撥壯丁3,116

⁷ 據四川省佛教會稱，四川各縣經常出現強拉僧人為壯丁之事。參見〈省教會通令各縣佛教會為軍管區司令部通令緩徵僧眾兵役〉，《四川佛教月刊》，第11年第3期（1940年3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60卷，頁152。

⁸ 重慶市北碚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重慶市北碚區志》（重慶：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重慶分社，1989年），頁1。

⁹ 劉小苑，〈全面抗戰時期北碚的兵員動員研究〉（重慶：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20年），頁23-24。

¹⁰ 據親與其事的葛向榮後來回憶，北碚的志願兵運動主要包括「擴大兵役宣傳」、「掀起從軍熱潮」和「實施待遇兌現」三點主要內容，即通過「社會運動」的方法動員轄區民眾志願參軍，並通過發起「志願捐運動」向轄區各界單位及個人募捐，以此兌現志願兵待遇。參見葛向榮，〈北碚地方當局抗戰事略〉，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北碚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北碚文史資料》，第4輯：抗日戰爭時期的北碚（重慶：出版

人，且以農民和工人為主，學生亦只有17人。¹¹ 北碚相對於川省其他地區而言，徵兵配額完成度很高，徵兵秩序良好，無需大規模強拉壯丁，這對具有學校和寺院雙重特徵的漢院而言，是其未受徵兵困擾的一個關鍵原因。

1943年9月11日，漢院卻突然收到北碚管理局公函，要求「合於免役條件者，應先依法申請」。¹² 按照兵役法規，地方政府在正式抽籤之前，需要進行壯丁調查，這是徵兵的重要程序，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壯丁免緩役申請的辦理。¹³ 對漢院進行壯丁調查，也就意味著開始對其進行徵兵。

為何抗戰後期北碚管理局要對漢院徵兵呢？此事與國民政府修訂「兵役法」直接相關。1943年3月15日，戰時國民政府對兵役法規進行了一次重大變革，即制定新「兵役法」，此次修訂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保證兵源充足。¹⁴ 其中最明顯的一個變化就是對免役、緩徵、緩召作明確規定，從而嚴格限定免緩役範圍。¹⁵

社不詳，1992年），頁46-51。關於抗戰時期北碚地區志願兵運動的最新研究，參見劉小苑，〈全面抗戰時期北碚的兵員動員研究〉，頁37-47。

¹¹ 劉小苑，〈全面抗戰時期北碚的兵員動員研究〉，頁70-71。

¹² 「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致北碚管理局」（1943年10月20日），〈關於檢送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教職員申請免緩役證明書、申請書合訂冊的往來公函（附免緩役證明書）〉，《北碚管理局》，檔號：0081004021590000133000。

¹³ 龔喜林，《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兵役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頁134。

¹⁴ 根據參與修訂「兵役法」的方秋華後來回憶，兵役署署長程澤潤在解釋新「兵役法」的變化時提到：「戰時要擴大兵源，每年計畫要徵五個年次的及齡男子當兵，不是限於一個年次（年滿二十歲）。」這樣就可以保證兵源充足。參見方秋華，〈抗戰時期的「兵役法」和兵役署〉，《民國檔案》，第1期（1996年3月），頁126。

¹⁵ 1943年新修「兵役法」第四條規定：「凡身體畸形、殘廢或有痼疾不堪服役者，免服兵役。」第二十條規定：「現役及齡男子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延期徵集，稱為緩徵：一、因公出國，在三年以內未能回國者；二、身體疾病不堪行動，經證明確實者；三、直系血親尊親屬或配偶死亡，未滿一個月者；四、專科以上學校肄業學生，年未滿二十五歲者；五、獨負家庭生計責任，無同胞兄弟者；六、犯罪在追訴中者。」第二十二條規定：「預備役及甲種國民兵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延緩動員召集，稱為緩召：一、現任小學以上教師，經審查合格者；二、現任薦任以上官職，經銓選合格者；三、現任軍需工業或國防工程交通之專門技術員工，經審查核定者；四、現任正規警察者；五、合於第九條各款或第二十條各款者。」參見「兵役法」（1943年3月15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2編軍事（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440-444。

因為在此之前，如徐思平所說：「我國『兵役法』，初因狃於歷史習慣，免緩役規定較寬，除國務院議員、小學教員、大眾學生、國防工人、醫師、會計師、新聞記者、主任官、公事務人員，皆得免緩兵役外，如鹽務工人、交通工人、郵電工人，甚至和尚亦得緩服兵役。故歷年所徵皆貧、弱、愚三者，使救國之神聖責任，擔於少數農工階級身上。」¹⁶ 此項調整，所針對的正是此前免緩役範圍過於寬泛的問題，意在通過緊縮免緩役範圍達到革除役政偏蔽的效果。

新「兵役法」明定免緩役範圍，對僧人造成了重大衝擊。一方面，舊「兵役法」規定：「國民兵役及常備兵役之免役、緩役事項，另定之。」¹⁷ 這一模糊不清的說法，是後來免緩役範圍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因為主管部門很有可能為了徵兵便利，以行政命令擴大免緩役範圍。¹⁸ 值得特別提及的是，國民政府此前的僧人兵役政策正屬於此類行政命令，而僧人能夠免予徵召當兵，即是因為這一政策。此時卻有了變化，新「兵役法」既已明文規定了免緩役範圍，此前通過行政命令「另定之」的各種免緩役政策自然作廢。另一方面，新「兵役法」中也未對僧人作特別規定，僧人若再申請免緩役，將面臨無法可依的窘境。

這種擔憂，不久就在僧界出現。1943年7月24日，中國佛教會溫嶺縣分會曾就此事，特地致函內政部詢問：「查國籍僧人免服常備兵役，服國民兵役，而以擔任救護工作，案經大部會商軍政部暨前訓練總監部，專案呈奉行政院，二十八年四月十九日核准免役飭遵在案。茲以新『兵役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所列緩徵各款，對於僧人漏未記載（舊『兵役法』亦無具體之規定），難免不發生有誤解之情事，亟應電請釋示。」¹⁹ 或許是中國佛教會溫嶺縣分會已看出情況有變，故意拿此前行政院的行政指令來試探主管部門。不料，軍政部經其提醒後直接向行政院提議：「漢族僧人，新『兵役法』既無緩徵規定，應與一般國民同服兵役義務，似應徵服常備兵役，無須僅服國民兵役。」²⁰ 這意味著，抗戰後期國民政府

¹⁶ 徐思平，《中國兵役行政概論》（重慶：文治出版社，1945年），頁209-210。

¹⁷ 「兵役法」（1935年3月2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軍事（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277。

¹⁸ 徐思平，《中國兵役行政概論》，頁11-12。

¹⁹ 「中國佛教會溫嶺縣分會理事長致內政部函」（1943年7月24日），〈內政部答復中國佛教會關於國籍僧人服兵役疑義案〉，《內政部》，檔號：12（1）-3320。

²⁰ 「渝江師管區司令部致北碚管理局代電」（1944年1月14日），〈關於辦理蒙藏僧人緩役

將開始對漢僧徵兵。

叁、申請緩徵、緩召及其困境

漢院接到北碚管理局的通知後，若以僧人身分申請，新「兵役法」中並無此項，只得另尋免緩役途徑。1943年10月20日，漢院回覆北碚管理局，聲稱：「其內部組織為邊疆文化教育機關，等於專科學校，曾經四川省政府教育廳立案。」並強調，其「所育人材以供政府邊政之用，歷年迭經蒙藏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選派入藏。值此籌邊孔急，國用須材之際，本院任務當不減於前方將士。所有教職員多係邊疆文化之專門學者，延自遠方，間有屬於淪陷區者，故本院人員多合於免緩條件」，同時函附「免緩申請書、證明書」合訂冊一份。²¹ 漢院提到其與中央政府邊政的關係，確有此事，並非完全為了威懾地方，容後分析。至少有一點非常清楚，漢院絲毫未提及其教員和員生多為僧人的事實。很顯然，他們仔細研究過新「兵役法」，知道僧人免役此時並無法律依據，於是試圖以「邊疆文化教育機關」比附「專科以上學校」一項作申請依據。

11月3日，北碚管理局函復漢院，卻並未就比附學校作直接回應。²² 其作法是指出所造申請材料不合規範，存在兩個問題：「一、申請書未引證兵役法規，並未往鄉公所審核加蓋鈐記；二、須加造免緩役名冊」，並「檢送兵役法令一本、免緩役名冊格式一份」給漢院，要求「各項書冊辦竣後須交由鄉公所查核遞轉」。²³ 其實，主要問題就一條，既然申請免緩役，就需要將援引之新「兵役法」何條何款講清楚。換句話說，地方政府的職責只在於登記造冊，至於是否屬

事宜致北碚管理局的代電》，《北碚管理局》，檔號：00810004030240000110000。

²¹ 「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致北碚管理局函」（1943年10月20日），〈關於檢送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教職員申請免緩役證明書、申請書合訂冊的往來公函（附免緩役證明書）〉，《北碚管理局》，檔號：00810004021590000133000。

²² 漢院應對北碚管理局的慣用手法，係以川省政府，乃至中央政府之名，鎮懾地方。此與本文關係並非必要，需另文呈現，此處不再贅述。

²³ 「北碚管理局致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函」（1943年11月3日），〈關於檢送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教職員申請免緩役證明書、申請書合訂冊的往來公函（附免緩役證明書）〉，《北碚管理局》，檔號：00810004021590000133000。

實自有審查機關公斷。

11月24日，漢院就此再次致函北碚管理局：「查本院為邊疆文化學院，自與專科以上學校同等，所有員生當合於修訂兵役法規第二十條第四款及第二十二條第一款。」²⁴ 對比新「兵役法」相關條款，其中第二十條對「現役及齡男子」申請緩徵做出規定，第四款為「專科以上學校肄業學生，年未滿二十五歲者。」第二十二條對「預備役及甲種國民兵」緩召情況進行規定，其中第一款為「現任小學以上教師，經審查合格者」。²⁵ 問題的焦點變成了漢院性質是否等同於「專科以上學校」，若確實如此，則緩徵、緩召自有根據。

漢院到底屬於什麼性質呢？這裡需要對其成立緣起及性質作一瞭解。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宗教信仰自由」雖載諸法令，但「黨義」凌駕一切，佛教因與「三民主義」不符，類屬改造甚至取締之列。²⁶ 太虛為首的佛教革新派為了緩和政教衝突，為佛教發展贏得寬鬆的政治環境，不僅在言論和行動上儘可能與國民黨的大政方針保持一致，²⁷ 更致力於彰顯佛教對社會乃至國家治理大有裨益。在1930年前後，不僅太虛個人與蔣介石保持著一定的聯繫，²⁸ 多數佛教徒亦表現出了非常高的政治參與熱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佛教界配合南京國民政府解決西藏問題。²⁹

漢藏糾紛自辛亥鼎革後清官員和軍隊撤出西藏，中央政府權威即大幅下降，

²⁴ 「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致北碚管理局函」（1943年11月24日），〈關於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員工緩服兵役〉，《北碚管理局》，檔號：00810004021600000159000。

²⁵ 「兵役法」（1943年3月15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2編軍事（一），頁442-443。

²⁶ 侯坤宏，〈黨義與佛法：國民黨訓政下的佛教〉，《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通識學報》，第4期（2015年4月），頁85-111。

²⁷ 1928年《海潮音》第9年第3期重刊孫中山〈復佛教會函〉，「圖像」一欄則附「孫總理遺像」和「杭州靈隱寺歡迎蔣總司令攝影」。參見《海潮音》，第9年第3期（1928年4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70卷，頁2、7-8。

²⁸ 侯坤宏，〈1930年代的佛教與政治：太虛法師和蔣介石〉，《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5期（2006年9月），頁126-132。

²⁹ 陳金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政教關係：以佛教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頁246-252。實際上，這也是整個抗戰時期，太虛為首的佛教革新派參與政治活動的重要內容。

而川藏邊界問題亦懸而未決，雙方紛擾不斷。³⁰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達賴和班禪皆有內向之意，為樹立中央政府權威，並向西南地區滲透，在西藏政府和四川軍政要員的請求之下，南京國民政府介入調解。³¹ 太虛等人亦以佛教為媒介，積極參與協調，為解決西藏問題建言獻策。³² 與此同時，川內各派系雖然接連火拚，但在川藏問題上卻體現出了一定的合作取向，其中以劉湘的第二十一軍最為積極。1930年9月，為打破漢藏隔閡，劉湘要求轄區各縣寺院、佛會選拔漢僧入康藏留學，促進漢藏文化溝通。³³ 10月，在四川省佛教會再三催促之下，太虛入川說法。³⁴ 太虛入川後，旋即建議劉湘，與其派人遊學，不如在川省設學院，聘漢藏講師，招漢藏青年共同研習。³⁵ 12月，劉湘派僧留學康藏計畫被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否決，³⁶ 轉而支持落實太虛的建議。1931年3月，劉湘同意由重慶佛學

³⁰ 馮明珠，《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1774-1925》（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年），頁252-271、310-311。

³¹ 1930年夏，由劉文輝控制的甘孜地區，白利土司和大金寺之間發生了一起財產糾紛。劉文輝部迅速出面干預，與大金寺武裝僧侶產生衝突，該寺隨即要求西藏政府出兵增援，從而演變成大規模川藏邊界戰爭，最終由南京國民政府派唐柯三出面調解。參見林孝庭著，朱麗雙譯，《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61-72。

³² 太虛，〈上國民會議代表諸公意見書〉，《海潮音》，第12卷第7期（1931年7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78卷，頁333-336；〈中國佛教會為蒙藏事呈國民政府文〉，《海潮音》，第12卷第7期（1931年7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78卷，頁338-339。

³³ 〈劉湘派僧入藏研經〉，《新聞報》，上海，1930年9月4日，版8。

³⁴ 川省連年戰爭，為籌劃軍費，軍方毀廟提產甚為嚴重，太虛與多位國民黨大員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因之為川省佛教界所重，此次入川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調解僧俗衝突。參見〈戴季陶先生致四川各軍長電〉，《海潮音》，第10年第10期（1929年11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73卷，頁493；〈克全上人來函：附四川佛教會致克全法師電〉，《海潮音》，第11卷第4期（1930年4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75卷，頁226；〈太虛法師在川說法之鱗爪〉，《海潮音》，第11卷第11、12期（1930年12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76卷，頁415-424。

³⁵ 〈太虛法師致劉甫澄軍長及川東各信佛者書〉，《海潮音》，第11卷第11、12期，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76卷，頁489-490；太虛，〈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緣起〉，《海潮音》，第13卷第1期（1932年1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80卷，頁75-76。

³⁶ 〈訓令：第四四四三號：令二十一軍司令部、蒙藏委員會〉（1930年12月16日），《行政院公報》，第213期（1930年12月），頁35。

社著手籌設漢院，並由其親信潘文華、李公度、何北衡等成立院董會。後由院董會推薦，太虛兼任院長，劉文輝為名譽董事長，劉湘為名譽院長，在資金和政策上給予大力支持。³⁷ 1932年8月，經過一年多的籌備，漢院正式開學招生。從漢院的創建過程不難看出，這所佛學院由四川軍政要員為其背書，具有相當深厚的政治背景。

實際上，漢院在前期就是太虛與劉湘政教合作的產物。明面上，漢院是太虛世界佛學苑的一支，從事佛教教育，尤其是藏文經典的研習，實則亦是劉湘與西藏政教界接觸的重要中介。³⁸ 在劉湘1935年就任四川省主席之前，漢院可視為第二十一軍的一個附屬機構。1936年3月，四川省政府頒布訓令，公示「私立學校及文化團體審查委員會議決二十四年度下期各項補助費數目表」，漢院名列其中，以最高標準年撥洋五千元作為補助費，並在「備考」一欄要求「須完備立案手續」。³⁹ 可見，在此之前漢院並未在川府立案。此時需立案，主要是為了將漢院的補助單位由第二十一軍變為川省教育廳。一直到該年8月26日，漢院才完成立案手續。⁴⁰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漢院確曾在四川省政府備案，然並非「專科以上學校」，而是「私立學校及文化團體」。

漢院對於自身這一性質，必然十分清楚，自知比附「專科以上學校」有所牽強，於是又對北碚管理局說到：「惟恐辦理免緩役審核機關未能明瞭本院性質，有所指駁，而轉增貴局煩難，故本院擬請層峰明示本院性質後再訂申請辦理。為

³⁷ 〈重慶佛學社籌設漢藏教理院事呈二十一軍部文〉、〈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司令部指令〉，《海潮音》，第12卷第8號（1931年8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78卷，頁457-458。

³⁸ 約1931年，劉湘曾致康定跑馬山絳巴格西一函，提及：「久欽名德，切係馳依，適屬艱危，尤殷法度，前囑漢藏教理院派藍文軒恭迎法駕，茲已起程在途，伏祈勿各悲懷，早臨渝郡，無任翹企。」參見「劉湘致絳巴格西函」（約1931年），〈二十一軍司令部關於班禪駐川辦事處各案及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成立駐京辦事處案件〉，《陸軍第二十一軍司令部》，四川省檔案館藏，檔號：民176-01-0191。

³⁹ 〈本府訓令：教字第二八一九號：令各私立學校〉（1936年3月），《四川省政府公報》，第39期（1936年3月），「命令」欄，頁27-28。

⁴⁰ 〈四川省指令：教字第二二九七〇號：令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院董會〉（1936年8月26日），收入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編，《漢藏教理院立案檔案編》（重慶：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1936年），頁56。

此除呈請四川省教育廳轉咨軍政部明令核示外，相應函請，於未奉層峰核定以前，本院員生至希暫緩徵召，以免廢棄邊教重任。」⁴¹ 12月2日，北碚管理局回稱：「查本局對於緩召、緩徵無權核定，已轉請上峰核示，按令再行轉達。」隨後將漢院所請，轉述於渝江師管區司令部，請求核定。1944年1月15日，渝江師管區回覆他們也需要轉請軍政部核實，才能有結論。⁴² 上傳下達之間，距離1943年9月北碚管理局通知漢院依法申請免緩役，已是四個月有餘。以此來看，漢院確有為其尋找解決方案，拖延時間的嫌疑。

1943年11月23日，就在致函北碚管理局的前一天，漢院呈長文致四川省政府，訴述其困境：「本院雖屬邊疆文化學院，但於免役條例似無明文指定。」可見，漢院對於自身私立性質不僅清楚，而且亦知比附專科以上學校有所牽強。但還是認為，漢院「以程度而論，招收新生限於初中畢業以上資格，而施以專門教育，其實質自等於專科以上學校。」因此，希望「鈞府（按：四川省政府）指定本院學生適用『兵役法』第二十條第四款，教員及邊疆文化從業人員適用第二十二條第一款，以便分別申請緩徵或緩召，而庶便邊疆文化教育事業得以維持。」⁴³ 前揭漢院曾於川府備案，對其性質，川府自然很清楚。或許是考慮到「兵役法」剛剛修訂，中央政府嚴格限定免緩役條件的態度已十分明確，川府自不便明目張膽為其「指定」。於是川府於12月24日通知漢院，表示會轉請教育部核覆。⁴⁴ 這樣漢院申請緩徵、緩召一案，上呈至中央政府。

1943年12月24日，四川省政府將漢院呈文轉呈教育部，並表示：「查該院本府無案，所請指定等於專科以上學校一節，不識已否呈准？貴部立案如已准

⁴¹ 「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致北碚管理局函」（1943年11月24日），〈關於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員工緩服兵役〉，《北碚管理局》，檔號：00810004021600000159000。

⁴² 「渝江師管區致北碚管理局函」（1944年1月15日），〈關於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員工緩服兵役〉，《北碚管理局》，檔號：00810004021600000159000。

⁴³ 「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呈四川省政府」（1943年11月23日），〈關於指定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適用兵役法的呈、訓令〉，《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重慶市檔案館藏，檔號：01230001000050100095000。

⁴⁴ 「四川省政府致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指令」（1943年12月24日），〈關於指出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是否適用兵役法〉，《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檔號：01230001000050100032000。

案，並請轉函軍政部核示。」⁴⁵ 川府所述亦屬實情，漢院確實沒有以「專科以上學校」資質立案。教育部亦回覆稱：「查該院未經本部核准立案，其辦理一切情形，亦無案可稽；所示轉商軍政部適用『兵役法』之規定一節，未便遵辦。」⁴⁶ 1944年2月19日，四川省政府將教育部的回覆轉給了漢院。⁴⁷

另外，軍政部接到渝江師管區請示之後，可能也曾就此事與教育部相關部門核實過。3月22日，渝江師管區收到軍政部審核結果，隨即回覆北碚管理局：「茲奉軍政部役宣字第〇二九五九號指令開：呈悉，查該院係私人講學機關，未經教育部立案，不能比照專科學校學生予以緩徵。」⁴⁸ 軍政、教育兩部的態度已很明確，按照新「兵役法」，作為「私立性質」的漢院，並不具備免緩役條件。

肆、法外豁免方案的形成

漢院由諸多四川軍政要人為其背書，北碚管理局不便管理，尚可理解。渝江師管區乃至軍政部，作為兵役主管部門，與漢院少有交集，對其不甚瞭解，亦屬實情。四川省政府對漢院性質本十分清楚，為何要將此案上呈至教育部呢？教育部為何又說「無案可稽」？漢院一再聲稱的邊疆文化教育事業究竟所指為何？這裡不得不有所說明。實際上，漢院確實與教育部有關係，並直接參與邊教項目，但實無立案一說。大體上，這種關聯，在漢院兵役案發生之前，重要者有兩次。

第一次，漢院設立編譯處。1938年3月，教育部次長顧毓琇參觀漢院，對太

⁴⁵ 「四川省政府致教育部函」（1943年12月24日），〈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請免兵役的有關文書及該院1944年上期教職員學生名冊〉，《教育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5-14808。

⁴⁶ 「教育部復四川省政府」（1944年2月8日），〈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請免兵役的有關文書及該院1944年上期教職員學生名冊〉，《教育部》，檔號：5-14808。

⁴⁷ 「四川省政府致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函」（1944年2月19日），〈關於指定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適用兵役法的呈、訓令〉，《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檔號：01230001000050100095000。

⁴⁸ 「北碚管理局致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函」（1944年4月9日），〈關於不准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員生緩役的函、代電、訓令〉，《北碚管理局》，檔號：00810004030250000076000。

虛述及，教育部長陳立夫與戴季陶正在商討關於蒙藏的教育問題，並建議他可以親自與陳立夫商量，尋求經費補助。3月26日，太虛就此事致函顧毓琇，進一步詢問。⁴⁹ 結果陳立夫對此事相當積極，答應：「准自本年四月份起，按月補助四百元，並指定為編譯漢藏合璧教科書之用。」⁵⁰ 其實，此事看似由顧毓琇聯絡，實則很有可能與戴季陶相關。因為該年3月8日至10日，國民黨中央派戴氏在漢院主持追薦班禪大師。在此期間，他曾與太虛就僧教育問題有過一場談話，其中可能討論過爭取政府補助的問題。⁵¹ 另外，在陳立夫剛就任教育部長之時，太虛曾與其討論教育問題，並得到陳氏的讚賞，二人應早有交情。⁵² 無論如何，得到教育部專項資助後，漢院隨即成立編譯小組，由代院長法尊法師擔任組長，統領編譯事務。法尊為太虛弟子，曾遊學康藏十年，精通藏文。此編譯小組為漢院正式加入教育部邊教工作的開端。

第二次，漢院欲設立康藏班。1940年3月17日，正當太虛率領佛教訪問團出訪印緬之時，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參訪漢院。他對漢院師生勉勵道：「諸位在此研究漢藏文字，對國家是有很大的貢獻的。」⁵³ 並就溝通漢藏、政教以及藏民內向三事作出重要指示。太虛結束訪問團事宜後，立刻著手落實。6月呈文行政院秘書處，擬定三條具體辦法：「一、延請西藏大德、喇嘛到內地講學弘揚佛教；二、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添設康藏班；三、增派漢僧赴藏留學。」對於這一方案，孔祥熙甚是滿意，要求教育部和蒙藏委員會仔細研究，並指示說：「此案

⁴⁹ 「太虛致顧毓琇函」（1938年3月26日），〈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編譯處組織方案及領取補助經費的文書〉，《教育部》，檔號：5-13162；〈漢藏教理院添設編譯處〉，《海潮音》，第19卷第5號（1938年5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8卷，頁348-349。

⁵⁰ 「顧毓琇復太虛函」（1938年4月9日），〈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編譯處組織方案及領取補助經費的文書〉，《教育部》，檔號：5-13162。

⁵¹ 太虛，〈中國的僧教育應該怎樣〉，《海潮音》，第19卷第4號（1938年4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8卷，頁234；印順編著，《太虛法師年譜》（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頁233。

⁵² 〈陳立夫部長來書〉，《海潮音》，第19卷第4號（1938年4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8卷，頁279。

⁵³ 演培、惟賢，〈記孔副院長講演〉，《海潮音》，第21卷第5、6號合刊（1940年6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200卷，頁92。

頗與邊疆開發及聯繫有關，應准照所請核辦。」⁵⁴ 可是，教育部與蒙藏委員會卻不甚積極。對於「增派漢僧赴藏留學」一項，蒙藏委員會答應「自卅一年度起每年補助漢僧名額增為四名，預計五年後本會每年經常補助赴藏遊學漢僧當為二十名」。⁵⁵ 至於延請藏僧講學，教育部表示此前已部聘喜饒嘉措，且正值抗戰，為安全考慮，可暫緩。關於設立康藏班一節，漢院最為主動，7月19日將經費概算書等呈給教育部，總經費竟達「二萬五千三百餘元」。⁵⁶ 教育部經內部討論認為：「該班係私立性質，然全部經費由國庫支給，與設立之性質不合，擬照原呈所列學、膳食、制服等費數目，年給補助五千四百元，自成立之月份起，請行政院轉飭財政部另款發給。其臨時費及常年經費不足之數，由該院自行籌畫。」並且明確表示：「該班係特殊教育，畢業學生除准入漢藏教理院繼續研究外，不得升入普通學校。」⁵⁷ 漢院最終以自籌經費不足為由，申請暫緩成立，其後不了了之。⁵⁸

漢院確實與教育部存在經費上的聯繫，其師生赴藏遊學也得到過蒙藏委員會的補助。正是因為有這層關係，它才對地方政府聲稱其為「邊疆文化教育機構」，參與中央政府邊政事務。僅憑這一點，地方政府就不得不慎重對待，究竟這種參與，程度如何、成效如何，倒無關緊要。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次聯繫，顧毓琇、陳立夫、戴季陶、孔祥熙等高官，在其中起著直接或間接的推動作用。可

⁵⁴ 「行政院秘書長魏道明致教育部函」（1940年6月21日），〈教育部有關漢藏教理院立案事宜、工作報告及有關經費補助的檔（附：該院經過、概況書等資料）〉，《教育部》，檔號：5（2）-1001。

⁵⁵ 「蒙藏委員會致教育部函」（1940年7月23日），〈教育部有關漢藏教理院立案事宜、工作報告及有關經費補助的檔（附：該院經過、概況書等資料）〉，《教育部》，檔號：5（2）-1001。

⁵⁶ 「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致教育部函」（1940年7月19日），〈教育部有關漢藏教理院立案事宜、工作報告及有關經費補助的檔（附：該院經過、概況書等資料）〉，《教育部》，檔號：5（2）-1001。

⁵⁷ 「教育部致行政院秘書處函」（1940年8月8日），〈教育部有關漢藏教理院立案事宜、工作報告及有關經費補助的檔（附：該院經過、概況書等資料）〉，《教育部》，檔號：5（2）-1001。

⁵⁸ 「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呈教育部」（1940年10月8日），〈教育部有關漢藏教理院立案事宜、工作報告及有關經費補助的檔（附：該院經過、概況書等資料）〉，《教育部》，檔號：5（2）-1001。

以說，漢院得到教育部經費支持，很大程度上正是太虛私人關係運作的結果。也應該看到，這種私人關係也是有限度的，教育部對待漢院的態度十分明確，始終沒有將其納入部內的意思，只是將其作為私立性質的文化機構，給予一定經費補助，至多是提供一些便利，因而1944年教育部所謂「該院未經本部核准立案」的說法亦是事實。

漢院的呈請一再受挫，說明按照常規程序，根本沒有免緩役的可能。3月中旬，太虛親往教育部和軍政部進行協商，他為此準備了三個方案：第一，繞開教育部科層，直接呈請教育部長陳立夫。結果卻出人意料，陳氏的態度與教育部司科截然不同，不僅答應可緩，甚至可以直接辦到「免役之地步」，並囑咐太虛「備一文到部，並教職員學僧名冊一份」。顯然，此前漢院呈文雖由川府轉呈教育部，係由相關司科辦理，決定層級可能不到部長，陳氏似乎並不知情。第二，採取迂迴方案，轉商軍政部長何應欽。因為太虛與何氏並不熟悉，未便直接呈請漢院免緩役之事，於是只就全國僧眾免役一事進行協商。太虛作為佛界領袖，就此提出意見，實屬正當。據說，他甚至對何氏提出「叢林、學院免役，小廟服役」的替代方案，因而招致川僧不滿。⁵⁹ 其實這一系列操作皆與漢院相關，因為若漢僧能夠免役，或叢林、學院能夠免役，漢院自可隨之免役。第三，備用方案，呈文軍事委員會，直接請蔣介石處理。⁶⁰

陳立夫既然答應協助，第二、三方案自然沒有必要。事實上，無論是全國僧眾免役還是漢院師生緩徵、緩召，後來軍政部皆未完全按照太虛的請求辦理。⁶¹ 3月24日，太虛按照與陳立夫的約定，呈文教育部秘書處，請求「准予本院員生與專科學校員生作同等待遇，轉咨軍政部，飭令兵役主管機關對於本院全體員生

⁵⁹ 印順編著，《太虛法師年譜》，頁281-282。

⁶⁰ 以上無特別注明處，皆引自太虛，〈與海定等書〉（七、八），收入太虛大師全書編委會編，《太虛大師全書》，第29卷雜藏·酬對（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頁105。

⁶¹ 前揭軍政部1944年3月22日給渝江師管區的指令，說明漢院申請免緩役並不符合新修「兵役法」，全國僧眾免役一事，後來軍政部做出讓步，主要還是因為川渝僧團的抗議。參見「渝江師管區司令部致北碚管理局代電」（1944年10月17日），〈關於緩徵蒙藏僧人服兵役的訓令、代電〉，《北碚管理局》，檔號：00810004030240000212000；印順編著，《太虛法師年譜》，頁281-282。

概予免徵。」⁶²並於次日，私函陳氏：「日前承教，當荷賜允『漢藏教理院補具呈文及名冊，可為轉咨軍政部，以免除全體員生關於兵役之徵召』。除以呈文及名冊逕呈外，另抄呈文，請即批轉為荷。」⁶³4月4日，陳立夫致函何應欽，建議說：「晚意此為對邊疆之一種重要工作，在一定員額之下准其免役，似屬可行。」⁶⁴4月19日，何應欽回稱：「查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既係屬於教育邊務專材，研究康藏文化、聯絡漢藏感情、輔助籌邊國策，為對邊疆之一種重要工作。且全院員生為數不多，自可在一定員額之下，准其比照行政院卅二年十月七日仁二字第二二三六九號指令，核定國內國立、公立學術研究機關，各大學附設研究部、研究所等員生，在選入研究期間，准暫免徵召之規定辦理，除分電渝江師管區外，即請查照轉知為盼。」⁶⁵至此，陳立夫與何應欽作為兩部部長，就漢院暫免徵召達成了共識。他們直接繞開了漢院想採用「是否屬於專科學校」的標準，而是以「對邊疆之一種重要工作」為由，法外豁免，准予暫免徵召。5月17日，教育部（部長）秘書室已開始擬稿，將何應欽的回覆轉達給漢院和太虛。⁶⁶

4月16日，雖然還未收到處理結果，漢院已十分自信地回覆北碚管理局：「查本院係邊疆專門教育機關，曾於二十一年呈請省教育廳立案，承撥款獎助。又於二十七年承教育部撥款在院設立編譯處，以期協助推進邊疆文化教育。嗣後即與教育部發生直屬關係，雖未具正式手續呈經立案，在事實上已蒙默許，為與專科學校有同等性質。」⁶⁷5月22日，漢院終於收到教育部（部長）秘書室的回

⁶² 「太虛致教育部秘書處函」（1944年3月24日），〈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請免兵役的有關文書及該院1944年上期教職員學生名冊〉，《教育部》，檔號：5-14808。

⁶³ 「太虛致陳立夫函」（1944年3月25日），〈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請免兵役的有關文書及該院1944年上期教職員學生名冊〉，《教育部》，檔號：5-14808。

⁶⁴ 「陳立夫致何應欽函」（1944年4月4日），〈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請免兵役的有關文書及該院1944年上期教職員學生名冊〉，《教育部》，檔號：5-14808。

⁶⁵ 「何應欽致陳立夫函」（1944年4月19日），〈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請免兵役的有關文書及該院1944年上期教職員學生名冊〉，《教育部》，檔號：5-14808。

⁶⁶ 「教育部（部長）秘書室致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箋」（1944年5月17日），〈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請免兵役的有關文書及該院1944年上期教職員學生名冊〉，《教育部》，檔號：5-14808。檔案中只提到「5月17日擬稿」和「5月19日繕寫譯電」，並未寫明發文時間，如從此後往還文書來看，這一箋正是「5月20日渝字第385號文」。

⁶⁷ 「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致北碚管理局函」（1944年4月16日），〈關於不准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員生緩役的函、代電、訓令〉，《北碚管理局》，檔號：

覆，立刻致函北碚管理局，轉達了陳立夫和何應欽的處理意見。⁶⁸

事情發展至此，延續半年之久的漢院兵役案已有定論。就在將要結案之際，卻發生了一個意外。5月26日，教育部突然有訓令傳達到漢院：「查該院係私人講學機關，未經本部立案，所請由本部轉咨軍政部飭令兵役主管機關，對於該院全體員生免徵一節，應毋庸議。」⁶⁹本來此案已經陳立夫與何應欽商定，由教育部（部長）秘書室轉達，已然定讞，為何教育部又出此批文？查教育部檔案，這一批文是由教育部高等司、社會司、蒙藏司三司商議的結果，並且教育部的批文中明白提到：「批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藏字第二二號呈一件」。此件正是太虛3月24日呈給教育部秘書處的呈文。這一批文的來歷應該是這樣的：太虛按照陳立夫的要求，3月24和25日分別呈文教育部秘書處和陳立夫本人，陳在接到太虛的函件後，立刻直接轉商軍政部長何應欽，後又由教育部（部長）秘書室直接承辦，這一過程並未經過教育部科層辦事程序，相關司科未必知曉。又因為此前四川省政府已有呈文轉呈，教育部司科也已經給出答覆，所以他們也就未再上報陳立夫批示，問題顯然出在教育部內部未協調好。這也從側面提示出，兩部部長對於漢院暫免徵召的處理，並不符合兵役法規，亦未經過常規辦事程序。

對於此事，太虛已有十分敏銳的覺察。6月2日，他再次致函陳立夫：「今接部批（附上），或係司科尚未知所致，敬祈部長轉囑司科，免後滋誤為幸。」⁷⁰6月12日，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科員沈壽紹對此事作了說明，他對官場之道十分熟稔，既知此案是由部長親自辦理，於是轉而強調此案已定讞，並提到：「調閱五月二十日渝字385號發文，便知甚詳。」⁷¹也就是教育部（部長）秘書室轉達何

00810004030250000076000。

⁶⁸ 「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致北碚管理局函」（1944年5月22日），〈關於暫緩徵召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員生入伍的呈、公函、批〉，《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檔號：01230001000090100082000。

⁶⁹ 「教育部致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函」（1944年5月26日），〈關於暫緩徵召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員生入伍的呈、公函、批〉，《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檔號：01230001000090100082000。

⁷⁰ 「太虛致陳立夫函」（1944年6月5日），〈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請免兵役的有關文書及該院1944年上期教職員學生名冊〉，《教育部》，檔號：5-14808。

⁷¹ 「教育部職員沈壽紹說明」（1944年6月12日），〈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請免兵役的有

應欽回覆的那一函箋。陳立夫當然亦不願深究，批示道：「私人講學機關由私人去商請託，既已允准，則免役自可有所根據。由部正式去文則可不必，兩無矛盾，原件附還。」⁷² 意思是說，陳氏本人知道漢院屬於私人講學機關，並且承認是由他以教育部名義轉商何應欽，後者也已經同意，自然不需要教育部科層再去回覆。實際上，5月22日漢院將教育部（部長）秘書室「渝字385號」箋函轉達給北碚管理局，但未見回覆，應該是太虛不清楚政府各機關的隸屬關係和職權，或急切想確定漢院暫免徵召事。關鍵在何應欽4月19日回覆陳立夫以後，軍政部不久即有公文下達渝江師管區司令部，而北碚管理局早在漢院轉達「渝字385號」公文之前已收到消息，既是由兩部部長親自辦理，自然不便再予深究。6月21日，教育部（部長）秘書室就此一插曲正式回覆漢院，轉達了陳立夫的意思：「該院員生准暫免徵召一節，可依據本年五月廿日渝字第385號通知辦理。」⁷³

伍、代結論——「私誼」與「公事」間的互動邏輯

漢院作為私立性質的文化團體，之所以能夠暫免徵召，直接原因是教育、軍政兩部部長協商後給予了法外豁免。這其中，陳立夫以教育部長身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請託作用。他們給出的理由是：漢院為「對邊疆之一種重要工作」。若僅就漢院對教育部邊教工作的參與來看，這一理由著實較為牽強。漢院從1938年4月開始領取教育部資助從事編譯工作，按規定每隔三個月需要將工作情形、經費分配及進度報部備案，其本職工作本應該是配合國立編譯館翻譯教科書。然從其彙報的編譯內容來看，大量經費用於藏傳佛教經典的翻譯。不惟如此，其譯就的教科書水準相當有限，很難達到教育部的要求。⁷⁴ 後來因為物價不斷上漲，常

關文書及該院1944年上期教職員學生名冊》，《教育部》，檔號：5-14808。

⁷² 「教育部（部長）秘書室致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函」（1944年6月21日），〈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請免兵役的有關文書及該院1944年上期教職員學生名冊〉，《教育部》，檔號：5-14808。

⁷³ 「教育部秘書（部長）室致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函」（1944年6月21日），〈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請免兵役的有關文書及該院1944年上期教職員學生名冊〉，《教育部》，檔號：5-14808。

⁷⁴ 「江安西《藏文初小常識課本》審定意見」（1941年11月21日），〈教育部有關漢藏教理

年經費不足，漢院的邊教事業其實名實不副。

陳立夫作為教育部長，不太可能不知道漢院對邊教的參與其實有限，甚至明知道其為私立性質，為何還要避開教育部，以私人名義為其請託呢？質言之，並非完全因為陳氏與太虛的私人關係，⁷⁵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蔣介石等人對太虛和漢院的特殊照拂。前述漢院欲成立康藏班，孔祥熙的大力支持即是一例。蔣介石對漢院和太虛的態度亦復如是，幾乎是有求必應。1942年12月，太虛致函蔣介石，建議「藉入藏僧侶，輸達中央德意」，具體辦法是：由在藏的大剛等十餘名漢僧組織「漢藏佛教協會」，以此聯絡藏中官僧首長，宣導中央恩威，引導他們傾向中央，並申請年給十萬元作為活動經費。惟恐書信往還被藏方檢查，所以需派漢院畢業生滿月、寂禪前往聯絡，需旅費和生活費共四萬元。蔣介石欣然應允，由侍從室公費股出資，並指示蒙藏委員會指導開展。⁷⁶後雖因顧忌藏方態度，「漢藏佛教協會」並未立即成立，但滿月和寂禪的生活費一直由侍從室撥款，並逐年增加。⁷⁷

對於這種來自高層的特殊優待，陳立夫介於其間，時常感到左右為難。1939年11月，蔣介石曾特地替太虛詢問陳立夫，可否設立「國立佛教學院」。最終教育部內部討論時，同意給予補助，但堅決反對由「本部直接籌設佛教學院」，破壞教育部對宗教團體興辦教育事業的規定，陳立夫無奈只能回絕蔣介石。⁷⁸就陳氏而言，他既不能公然違背教育部相關規定，又不能不對上級領導的態度有所顧

院立案事宜、工作報告及有關經費補助的檔（附：該院經過、概況書等資料）》，《教育部》，檔號：5（2）-1001。

⁷⁵ 印順法師後來編著太虛年譜時曾提及：戰後，蔣介石曾圈定太虛為國民大會代表，正是因為陳立夫「力持異議，致其事中變」。印順不由感嘆道：「蔣主席與大師之友誼，久為近侍集團所礙，日以疏遠。」可見，陳立夫並不見得會因為與太虛的私人關係而違反法定程序。參見印順編著，《太虛法師年譜》，頁291。

⁷⁶ 「侍從室第三處主任陳果夫報告」（1942年12月22日），〈藏務（二）〉，《國民政府》，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59200-00017-001。

⁷⁷ 「吳忠信呈蔣介石」（1943年6月29日），〈藏務（二）〉，《國民政府》，典藏號：001-059200-00017-002。

⁷⁸ 「陳立夫致電蔣介石」（1939年11月29日），轉引自龔雋、賴嶽山，〈「太虛檔案」二：太虛法師與佛教教育（1938年之後）〉，收入中山大學人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主辦，《漢語佛學評論》，第4輯，頁48-50。前揭漢院設立編譯處以及康藏班，教育部的態度亦是例證。

及。有個細節值得注意，對於漢院免役事，當陳立夫與教育部三司會商意見相左時，他轉而強調為漢院轉請何應欽係私人行為，與教育部無關，實際上亦有安撫之意。

需要注意的是，太虛及漢院享受的這種來自國民黨中央高層的特殊優待，看似是因為私人關係，實則是戰時佛教與西藏問題乃至外交工作關係甚深。1939年10月至1940年5月，太虛率領佛教訪問團訪問印緬等地。此事最初由太虛動議，實際上是由國民黨中央一手策劃的一場國民外交活動，牽涉部門甚廣，由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朱家驊傳達蔣介石口令，由該黨中央社會部部長陳立夫承辦，外交部、蒙藏委員會、中央宣傳部等參與配合。其目的在於抵制日本在此處對國民政府所謂壓制佛教的惡意宣傳，聯絡印緬等佛教國家支持中國抗戰。⁷⁹ 由此便不難理解，為何孔祥熙要在太虛出訪之時，參訪漢院並大加激賞。此事過後，太虛不僅個人威望達到頂峰，更增強了國民黨中央高層對他的信任和好感。⁸⁰

另外，在國民政府應對西藏問題的策略中，佛教和漢僧始終占據一定位置。1933年12月，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南京國民政府立即派遣黃慕松使團前往拉薩。就在使團準備出發之際，1934年3月7日，蔣介石緊急致電汪精衛：「最好帶有思想與智識之僧人數名同行，並使其久駐在藏，一面學教，一面聯絡以固藏人內向之心。此時中央對於藩屬政策，則以五族聯邦與民平時為號召，手段則惟有以聯絡感情與勾〔溝〕通文化為媒介，一面則設法開闢交通，先設航空郵路為起點。何如？請與季陶先生一商之。」⁸¹ 顯然，「以聯絡感情與溝通文化為媒介」實為此時南京解決西藏問題的重要策略，戴季陶在其中的作用非同小可。⁸² 聯想

⁷⁹ 隨著相關檔案的公布，此案諸多細節漸趨明朗，現有研究參見李仲良、楊銘，〈抗戰時期的中國國際佛教訪問團研究〉，《中華文化論壇》，第10期（2016年10月）。

⁸⁰ 戰後，太虛代表佛教界接受「抗戰勝利勳章」。中國宗教徒聯誼會常務理事主席白崇禧在保舉詞中特別提及：「二十八年組織佛教訪問團前往南洋各地宣揚我國抗建大業，深得彼邦人士及僑胞之同情，有助我抗戰實非淺鮮。」參見「白崇禧呈蔣介石」（1945年11月），〈勝利勳獎章（七）〉，《國民政府》，典藏號：001-035100-00126-012。

⁸¹ 「蔣介石致汪精衛電」（1934年3月7日），〈積極治邊（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2-00014-381。

⁸² 可惜的是，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戴季陶》全宗檔案並未開放，其在佛教與政治互動中的重要聯結作用，尚無法梳理清楚，然種種跡象表明，其人乃國民政府時期推動中國佛

到漢院從開院起，即強調其使命為：「溝通漢藏文化、聯絡漢藏感情」，足見太虛消息靈通。

不僅是戰前如此，有研究者甚至指出：國民政府應對西藏問題的策略自始至終都是軟弱無力的，雖然不斷有人提議中央採取強硬手段，但國民政府在具體落實時，往往優先考慮穩健務實的應對方式，諸如宣傳滲透、辦學以及加強漢藏佛教徒之間的互動等。⁸³ 1942年，太虛所提的「漢藏佛教協會」方案之所以得到蔣介石認可，正是因為符合國民政府解決西藏問題的大政方針，而滿月和寂禪雖未能完成計畫任務，卻積極為解決西藏問題建言獻策，甚至提供情報。⁸⁴ 而國民政府利用漢僧聯絡西藏官僧，並進行滲透和搜集情報，最顯著者即漢院畢業生碧松法師，此僧因在西藏政教兩界的特殊地位，曾受到蔣介石的親自接見。⁸⁵

由此可以斷言，陳立夫所謂「對邊疆之一種重要工作」，其所指並非教育部的邊教事業，而是太虛及漢院對國民政府西藏邊政的參與和影響。由於漢院設立康藏班一案、蔣介石為「國立佛教學院」請託一事以及佛教訪問團的整個過程，陳立夫皆參與其中，有理由相信他對蔣介石等人優待太虛和漢院的態度必然十分清楚。況且太虛與漢院確實於抗戰建國貢獻頗多，於公於私，他以私人身分為其

教發展的關鍵人物。

⁸³ 林孝庭著，朱麗雙譯，《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頁190-202。

⁸⁴ 「太虛法師呈蔣介石為轉呈滿月、寂禪二僧請撥赴藏旅費及西藏行政報告」（1945年6月4日），〈藏務（二）〉，《國民政府》，典藏號：001-059200-00017-003。

⁸⁵ 釋碧松（1916-2014），俗名邢肅芝，藏名洛桑珍珠，8歲在興化縣安樂寺出家，漢院藏文專修科第一期畢業生，1937年在太虛法師的推薦下，成為第一批第一個由官費資助的入藏漢僧，在藏學法和辦學前後達十三年之久，1945年成為第一位獲得藏傳佛教最高學位——拉然巴格西的漢僧。1945年4月返回重慶，受到蔣介石接見。參見邢肅芝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修訂本），頁325-327；「羅良鑑電蔣介石為請召見由藏回渝之碧松和尚」（1945年3月31日），〈西藏政情（二）〉，《國民政府》，典藏號：001-059200-00003-001。受到蔣介石資助後，碧松重返拉薩辦學，並為中央政府提供西藏情報。參見「碧松和尚呈蔣介石為請核撥赴藏印邊境考察旅費並賜以相當名義附呈治藏計畫」（1945年4月17日）、「碧松和尚呈國民政府文官處政務局為一年來西藏政局概況」（1946年12月30日），〈西藏政情（二）〉，《國民政府》，典藏號：001-059200-00003-002、003；「碧松和尚電蔣介石為呈藏軍攻入色拉寺格殺喇嘛慘絕人寰盼中央迅派軍入藏」（1947年5月6日），〈藏王達札與熱振交惡（四）〉，《國民政府》，典藏號：001-059200-00012-002。

請託都在情理之中。

侯坤宏曾詳細梳理過太虛與蔣介石之間的交往，並指出二人關係中，「除含有私人交情外，更涉及政治與宗教的互動與關涉。」⁸⁶ 這一見道之論，不僅適用於二人關係，更可擴展為對戰時政教（佛教）關係的總結。需要補充的是，究竟這種「私誼」與「公事」之間存在怎樣的邏輯聯繫，二者又是如何交互作用進一步型塑政教（佛教）關係的呢？漢院兵役案的解決，看似由「私誼」促成，實則無論是陳立夫的私人請託，還是陳氏對蔣介石等人特殊優待的顧及，都與「邊疆」這一「公事」密切相關。退一步言之，若非太虛和漢院確實於邊政「公事」貢獻頗多，很難想像陳立夫會選擇避開教育部，以私人身分介入請託，他完全可以像「國立佛教學院」一案的處理方式一樣，以教育部三司抗議為由拒絕。一言以蔽之，正是戰時政教（佛教）雙方於「公事」上的互動和合作，使得彼此之間建立了互信和比較和諧的關係，也正是在這一基礎上，「私誼」發揮了作用，轉又反作用於政教（佛教）之間的「公事」。可以說，正是這種「私誼」與「公事」之間的互動邏輯不斷型塑著戰時政教（佛教）關係。

兵役案的解決亦展示出太虛及漢院於不利局面下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動性和策略。1940年5月，太虛結束出國訪問行程，在昆明接受學僧採訪時曾說：「我一向主張：裁減僧數，提高僧格。這少數有高深智學的僧人，站於超然的地位，專門做些弘揚佛法，辦理社會公益的事業，既不障礙於行政，且可補助政治之所不及；政治方面則負保護佛教的責任。如是，政教不合一，亦不是截然無關係；這種不即不離，相互裨益的政教關係，是最切合於中國的環境和情形的。」⁸⁷ 大體上，「不即不離，相互裨益」可視作太虛對政教關係所持的基本態度。這種看似合情合理的說法，毋寧只是太虛的一種願望，一旦進入現實，不僅難以實現而且存在矛盾。國民政府對待佛教的態度雖然比較務實，⁸⁸ 然畢竟「三民主義」高

⁸⁶ 侯坤宏，〈1930年代的佛教與政治：太虛法師和蔣介石〉，《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頁131。

⁸⁷ 太虛，〈由青年路向問到佛教革興〉，《覺音》，第17期（1940年9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92卷，頁204。

⁸⁸ 王奇生曾提到：國民黨作為弱勢獨裁政黨，其控制力很難觸動既存的社會結構，也未能深入社會內部，亦習慣於網羅舊的社會權勢力量或具有權勢潛能的人。這不能不說也是國民黨人對佛教採取務實態度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參見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

於一切，佛教一直被視作一種需要改造的「落後宗教」。⁸⁹ 這種現實擺在太虛面前，試問如何做到「不即」？史家陳寅恪曾說：「世人或謂宗教與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參互合論，然自來史實所昭示，宗教與政治終不能無所關涉。」⁹⁰ 若不積極參與政治，「補助政治之所不及」，何來所謂「相互裨益」？對漢院徵兵，是在抗戰後期國民政府進行役政調整的大局下進行的，完全合法合規，卻在事實上造成了對漢院利益的損害。於此不利局面下，漢院並未選擇積極配合，而是以「邊政」作為博弈的槓桿，從中尋求利益的最大化。換言之，面對強勢的國家主義，當佛教處於不利局面時，太虛並未選擇「不障礙於行政」，恰恰是援引佛教「補助政治之所不及」之貢獻作為砝碼，與國民政府討價還價。因此，主動參與政治，不斷增加與政治博弈的砝碼，以達到相互裨益的可能和效果，才是太虛現實中處理政教關係的策略。

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頁358。

⁸⁹ 蔣介石雖然很注意利用佛教來解決西藏問題，與太虛關係也頗佳，卻曾在日記中提到：「中國宗教應以耶教代佛教，方可與歐美各民族爭平等，而民族精神之發揚與因有德性之恢復，亦能得事半功倍之效果。」蔣介石這一態度，對國民黨的佛教政策不無影響。參見《蔣介石日記》，1936年2月15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藏。即使是與佛教界關係密切的戴季陶，在國民黨內也不無微詞，陳克文就曾提到：「尋思中委如戴季陶尚不免佞佛」。參見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1937年2月27日，頁37。1940年6月，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的王世杰，曾參與「佛教訪問團」計畫的整個過程，卻在日記中評價太虛道：「此人雖為僧，實則江湖遊說之士。」參見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1940年6月8日，頁288。這或可提醒我們，即使是積極配合國民政府大政方針的太虛革新派，在國民黨內亦未能被完全接受，遑論其他堅持傳統宗教生活方式的叢林寺僧。

⁹⁰ 陳寅恪，〈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收入陳美延編，《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272。

徵引書目

一、檔案

《內政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內政部答復中國佛教會關於國籍僧人服兵役疑義案〉。

〈全國壯年僧尼悉令參加救護訓練工作的有關文書〉。

《北碚管理局》（重慶，重慶市檔案館藏）

〈關於不准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員生緩役的函、代電、訓令〉。

〈關於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員工緩服兵役〉。

〈關於指定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適用兵役法的呈、訓令〉。

〈關於暫緩徵召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員生入伍的呈、公函、批〉。

〈關於緩徵蒙藏僧人服兵役的訓令、代電〉。

〈關於檢送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教職員申請免緩役證明書、申請書合訂冊的往來公函（附免緩役證明書）〉。

《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重慶，重慶市檔案館藏）

〈關於指出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是否適用兵役法〉。

〈關於指定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適用兵役法的呈、訓令〉。

〈關於暫緩徵召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員生入伍的呈、公函、批〉。

《教育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編譯處組織方案及領取補助經費的文書〉。

〈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請免兵役的有關文書及該院1944年上期教職員學生名冊〉。

〈教育部有關漢藏教理院立案事宜、工作報告及有關經費補助的檔（附：該院經過、概況書等資料）〉。

《國民政府》（臺北，國史館藏）

〈西藏政情（二）〉。

〈勝利勛獎章（七）〉。

〈藏王達札與熱振交惡（四）〉。

〈藏務（二）〉。

《陸軍第二十一軍司令部》（成都，四川省檔案館藏）

〈二十一軍司令部關於班禪駐川辦事處各案及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成立駐京辦事處案件〉。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積極治邊（三）〉。

《蔣介石日記》（Palo Alto,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二、史料彙編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軍事（一）、第2編軍事（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1998年。

太虛大師全書編委會編，《太虛大師全書》，第29卷雜藏·酬對（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

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編，《漢藏教理院立案檔彙編》。重慶：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1936年。

三、日記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四、雜誌、報紙

《四川佛教月刊》，成都，1940年，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60卷。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年。

《四川省政府公報》，成都，1936年。

《行政院公報》，南京，1930年。

《軍政公報》，南京，1936年。

《海潮音》，泰縣，1928-1930年；上海，1931-1932年；武昌，1936、1938年；昆明，1939年；重慶，1940年；貴陽，1944年；南京，1946年（受經費和戰爭影響，編輯部地點時有變更）。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70卷、第173卷、第175-176卷、第178卷、第180卷、第198-201

- 卷、第203卷。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年。
- 《新聞報》，上海，1930年。
- 《覺音》，澳門，1940年。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92卷。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年。

五、專書

-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
- 印順編著，《太虛法師年譜》。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
- 邢肅芝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修訂本。
- 林孝庭著，朱麗雙譯，《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年。
- 重慶市北碚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重慶市北碚區志》。重慶：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重慶分社，1989年。
- 徐思平，《中國兵役行政概論》。重慶：文治出版社，1945年。
- 陳金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政教關係：以佛教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 馮明珠，《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1774-1925》。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年。
- 龔喜林，《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兵役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

六、期刊論文、專書論文、學位論文

- 方秋葦，〈抗戰時期的「兵役法」和兵役署〉，《民國檔案》，第1期（1996年3月）。
- 李仲良、楊銘，〈抗戰時期的中國國際佛教訪問團研究〉，《中華文化論壇》，第10期（2016年10月）。
- 侯坤宏，〈1930年代的佛教與政治：太虛法師和蔣介石〉，《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5期（2006年9月）。

- 侯坤宏，〈黨義與佛法：國民黨訓政下的佛教〉，《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通識學報》，第4期（2015年4月）。
- 陳寅恪，〈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收入陳美延編，《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 葛向榮，〈北碚地方當局抗戰事略〉，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北碚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北碚文史資料》，第4輯：抗日戰爭時期的北碚。重慶：出版社不詳，1992年。
- 劉小苑，〈全面抗戰時期北碚的兵員動員研究〉。重慶：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20年。
- 龔雋、賴嶽山，〈「太虛檔案」二：太虛法師與佛教教育（1938年之後）〉、〈「太虛檔案」三：太虛法師與漢僧兵役（1943-1944）〉、〈重估太虛法師（引論）——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民國教育部檔案為中心〉，收入中山大學人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主辦，《漢語佛學評論》，第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